

西晋王朝建立及建设的两个问题

梁满仓

(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北京 100732)

摘要:在西晋政权建立过程中,司马昭与曹操在曹魏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相似的作用,有着相似的地位,但是前者仅算作是一个政客和野心家,后者则是一位在政治、军事和文学方面均有重大建树的超世英雄。司马氏政权的继承方式先为父死子继,后是兄终弟及,最终又回到父死子继,这种继承现象,只能从血缘关系与利益的平衡角度去认识。

关键词:西晋;司马懿;曹操;司马昭

中图分类号: K237.1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9-7902(2013)04-0019-04

西晋王朝的建立,包含了司马懿祖孙三代人的努力。司马懿在曹操、曹丕、曹叡时屡立军功,威望不断上升,权力不断增长。魏帝曹芳时,司马懿通过高平陵政变,一举除掉政治对手曹爽集团,又镇压了王凌的起兵反抗,掌握了曹魏大权。司马懿去世后,长子司马师出任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,继续掌握军政大权。他将李丰、张缉、夏侯玄等人发动的政变扑灭于萌动之中,又废掉魏帝曹芳,另立曹髦为帝。毋丘俭、文钦等人不服,起兵反抗,镇压此次兵变之后,48岁的司马师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。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继续出任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在任期间,平定诸葛诞起兵于淮南;杀死魏帝曹髦于宫中,另立曹奂为新帝;出兵益州灭掉蜀汉,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;晋封为晋王,为登帝位做好准备。但司马昭称帝的最后一步还没来得及迈出,便走完了55岁的人生历程。

司马氏祖孙三代所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接力长跑,司马懿是第一棒,为西晋王朝建立奠基;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是第二棒,为西晋王朝建立准备条件;司马炎是第三棒,水到渠成取代曹魏。司马炎达到了顶点,也开始了西晋政治的拐点。在这个过程中,有两个问题耐人寻味,值得深思。

一、司马昭与曹操比较

从曹魏明帝去世以后,司马氏与曹氏两大政治

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,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公元254年,司马氏取代曹魏的政治进程进入了关键时期。这一年年初,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、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,欲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辅政。司马师闻讯,立即组织反击,杀死李丰、张缉、夏侯玄等人。九月,废掉魏帝曹芳,另立曹髦。不料按下葫芦起了瓢,次年正月,镇东大将军毋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对司马师。司马师率师亲征,虽然平定了叛军,却因旧病复发,且日益加重,病死在许昌。

处于绝望中的魏帝曹髦似乎又看到了反扑的机会。他下了一道诏书,以东南刚刚平定为借口,命司马昭镇守许昌,让尚书傅嘏帅六军回京师。曹髦想用这个机会使司马昭与军队分离,乘机剥夺他的兵权。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当然蒙骗不了深谙权谋的司马昭,他并没有执行曹髦的诏书,而是与傅嘏一起亲自率军回洛阳。曹髦的如意算盘落空,只好让司马昭继任大将军辅政。^[1]

这是司马氏与曹氏政治斗争的关键回合,这个回合的胜利,使军权牢牢掌握在司马昭手中。

从司马懿到司马昭,司马氏进入了这样一种怪圈:他们在加强自己权力巩固自己地位的斗争中,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然而这些胜利并没有给他们定下心来享受的机会,而是逼迫他们必须面对新的斗争,赢得新的胜利,否则,他们前面所取得的胜利便都前功尽弃。推动司马氏在这种怪圈中旋

收稿日期:2013-04-30

作者简介:梁满仓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。

转的有两种力量：一种是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旧臣。他们有的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，如李丰是皇室亲家，张缉是皇家外戚。他们眼见司马氏的权力越来越大，自己的权力地位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，所以图谋限制司马氏的势力。而斗争的结果，又把更多的反对力量裹了进来。例如毋丘俭，与夏侯玄、李丰等人关系甚密，夏侯玄、李丰被杀，毋丘俭为自身安全考虑，自然要起兵反对司马师。另一种是曹魏皇帝，因为司马氏势力的壮大，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为前提的，二者的关系呈此消彼长的状态。

司马氏面对这两种力量，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有优势。在政治上，他们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，这是一股在政治上新兴起来的力量；军事上，他们控制着国家的武装。然而在道义上，司马氏却捉襟见肘。在名分上，司马氏毕竟是臣子，臣子时时威胁着君主的安全，便违反了“忠”的道德准则，在道义上则授反对派以把柄，使他们兴兵讨伐有了义正词严的口实。毋丘俭起兵，宣布司马师十一大罪状，其中“坐拥强兵，无有臣礼”；“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”；“目无君主”；“矫诏废主”；“逼恐至尊”；“慢待君主，不奉法度”，每一条都把司马氏逼到了道义上的绝境。^[2]

司马氏可以用武力打败对手，但无法在道义上证明自己符合忠君德义的规范。这是司马氏的天然缺陷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代替曹魏皇帝，成为天下君主，这样就可以要求别人尽忠，自己则免去了忠君的义务。所以，到了司马昭这里，做了两件大事，对最终代替曹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

第一件事，杀死魏帝曹髦。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，标志着他比父兄走得更远，司马懿只是杀死曹爽，没有对皇帝动手。司马师对皇帝进行废立，未起杀戮之心。司马昭则对魏帝不但剥夺其政治权力，而且剥夺其生存权利。这表明其除掉取代曹魏道路上一切障碍的决心。

第二件事，灭掉蜀汉，打破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这件事无论对中国历史进程还是对司马昭代魏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司马昭主政时期，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，可以说立下不世之功，无人可及。灭蜀之后，司马昭先接受了晋公的封号，不久又进爵为晋王，就像当年的曹操一样，离帝位只差一步之遥了。

司马昭有很多地方确实与曹操很像：曹操统一北方，司马昭灭掉蜀汉；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司马昭玩弄魏帝于股掌之上；曹操虽称魏王，却享受皇帝的一切待遇，司马昭最后称晋王，也具有皇帝一般的权力；曹操娴熟于权术，司马昭擅长于弄权；曹操镇压反对派毫不手软，司马昭对待政敌斩尽杀绝。

然而，人们在评价这两个人时，论断却大不相同。曹操被认为是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，用鲁迅先生的话讲，“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至少是一个英雄”。而司马昭却被人们认为是个野心家，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”，这句话流传了上千年，一直没有变过。

到底是什么使曹操与司马昭有这样的区别呢？换言之，两个人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？

毫无疑问，曹操与司马昭都是非常聪明之人。但是，曹操除了把聪明才智用到了与司马昭相同的地方，还用到了政治、军事、文学等领域的思想建树方面。这里的“思想”是哲学意义上的，即通过意识中的思维活动对客观现象形成的具有理论意义的观念。曹操政治思想方面，如“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”，“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赏功能”，“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，“唯才是举”，“取士勿废偏短”，“治定之化，以礼为首；拨乱之政，以刑为先”等等都非常著名，而且影响后世。在军事方面，他主张“用干戚以济世”，即武力为救助社会服务。提出“恃文者亡”，“恃武者灭”，主张文武并用，不可偏执一端。在文学方面，主张清简，反对浮华，主张诗文以言志，反映社会现实。他的著名诗篇《薤露》、《蒿里行》、《却东西门行》、《观沧海》、《龟虽寿》等体现了这些主张。这些比起权术谋略来，是更高层次的大智慧，而权术谋略只是低层次的小聪明。司马昭不乏权术谋略，但缺少曹操那样的思想建树，这使他只能成为政客和野心家，而不能成为超世的英雄。

二、两种兄终弟及

中国历史上的王位继承，曾经有过“兄终弟及”制度和“父死子继”制度。前者是严密的宗法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，后者是嫡长子继承制成熟的表现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，殷商是“兄终弟及”，姬周是“父死子继”，这个发展顺序，也说明两种王位继承制度的更替与宗法制度发展成熟的关系。

然而，三国曹魏以后，司马氏家族的继承方式也存在两种，先是父死子继：司马懿去世后由长子司马师继承。接着是兄终弟：司马师去世后由弟弟司马昭继承。然后又返回到父死子继：作为嫡长子的司马炎继承了王位。这种现象很难从宗法制度角度去解释，因为这时候宗法制度已经过长期发展相当成熟。况且司马家族继承现象是，父死子继在先，兄终弟及在后，不能解释为司马家族从嫡长子继承后退到宗法制度极不成熟的状态。

司马氏家族的继承现象,只能从血缘宗亲关系与利益关系之间权衡的角度去观察。

司马炎建立西晋后,推崇以“孝”治天下。人们认为,这是因为司马氏作为曹魏的臣子,却篡夺了曹魏的天下,忠字自然羞于说出口,只能以孝弥补道义上的不足。这种分析毫无疑问是具有说服力的。然而人们忽视了以孝治天下的另一面,作为儒学传家的司马氏家族,对孝悌的提倡是出自内心的,而孝悌所维系的就是家族兄弟间的血缘关系。司马炎是非常重视血缘关系的,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说明:

第一件事,不顾众人反对,力挺长子司马衷为自己的接班人。司马衷不是坐天下的料。有人说他是个白痴,这虽然有些夸张,但说他平庸,平庸得乃至不会治理国家则是千真万确的。史书上记载这样一件事:有一年全国发生灾荒,饿死了很多人。司马衷听说后问他身边的人:“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?”很多人对他被立为太子作皇帝的继承人很不放心。太子太傅卫瓘多次想启奏司马炎改立太子,又怕说出来惹他不高兴。有一次司马炎在凌云台举行宴会,卫瓘假说喝醉了,跪在司马炎的座位前,说:“臣有事要启奏。”司马炎问:“你有什么事要说?”卫瓘几次欲言又止,最后摸着皇帝的宝座说:“此座可惜!”

司马炎曾对司马衷的才能进行过考察,他把东宫太子的属官全都召集在一起,使司马衷手下无人,然后派人给司马衷送去密封的文件,写的是需要处理的几件事。信送进去之后,使者就在外面等着。司马衷的妃子贾氏急忙请人代笔答复,所作答复多引经据典。一个叫张泓的人说:“太子不学,人皆知晓。引经据典会露出破绽,不如直以意对。”贾氏大喜,让张泓草拟答复,然后让司马衷抄一遍,送给司马炎。这次所谓“考查”,其实是为了堵住众人的嘴。因为司马衷的才能如何,不用别人说,司马炎是非常清楚的。史书记载说,司马炎认为太子司马衷不堪奉大统,与皇后杨氏密谋。杨氏说:“立嫡以长不以贤,岂可动乎?”明知道太子不堪奉大统,却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,这是司马炎与皇后所取得的“共识”。所以,当他拿到由张泓起草的答复时,根本不去辨别真伪,首先拿给反对司马衷做继承人的卫瓘看,使他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不敢再说三道四。

第二件事,大肆分封同姓宗室。司马炎称帝后,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,皇叔父司马幹为平原王,司马亮为扶风王,司马佃为东莞王,司马骏为汝阴王,司马彤为梁王,司马伦为琅邪王,皇弟司马攸

为齐王,司马鉴为乐安王,司马机为燕王,皇从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,皇从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,司马晃为下邳王,司马瓌为太原王,司马珪为高阳王,司马衡为常山王,子司马文为沛王,司马泰为陇西王,司马权为彭城王,司马绥为范阳王,司马遂为济南王,司马逊为谯王,司马睦为中山王,司马陵为北海王,司马斌为陈王,皇从父兄司马洪为河间王,皇从父弟司马楙为东平王。

为了加强封国的权力,司马炎还实行封国领兵制。将所封的王国分三等,大国置上、中、下三军,共5000人;中国置上、下二军,共3000人;小国置一军,1500人。同时撤销州郡兵。此前,州刺史、郡守为地方军政长官,拥有兵权,故州刺史称州将,郡守又称郡将。灭吴以后,“州郡悉去兵,大郡置武吏百人,小郡五十人”。

司马炎重视血缘关系是可以理解的。司马氏代替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过程中,血缘宗亲一直是强有力的支持力量。司马炎称帝后,认为曹魏亡在“强干弱枝”,宗室受控过严、皇权孤立无援,这种认识更加强了他对血缘宗亲的依靠。

俗话说,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。血缘之亲的确是不可忽视的力量,但是,打虎之后亲兄弟有可能为分虎皮虎骨而闹翻,胜利之后亲父子有可能为分配果实而绝情。血缘关系要接受利益关系的考验。当利益的重要性并不突出的时候,血缘关系能够维持得很好,当利益的要求高于血缘关系时,血缘关系就岌岌可危了。司马炎所依靠的血缘宗亲,同样具有这样的两面性。

司马攸是司马炎的亲弟弟,因为司马师没有儿子,所以很早就过继给司马师作嗣子。这就意味着司马攸将是司马师的继承人,然而司马师死后,继承他的不是嗣子司马攸,而是弟弟司马昭。司马昭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合长子继承的法统,常说“此景王之天下也”,表示要立司马攸为世子。但是在他临终前,还是把继承权交给了司马炎。在王位继承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上,司马昭把兄弟之情完全丢在一边。

司马炎晚年,由于诸子并弱,太子司马衷不才,朝臣内外全都认为司马攸应该作帝位继承人。为了保住太子地位,司马炎逼着司马攸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国。当时司马攸重病缠身,抱病上路,当下即呕血而死。在帝位继承这件利益攸关的事上,司马炎也完全不顾兄弟之情。

力挺无能太子是为了保证自家的皇统,大封诸王和王国领兵,是为了通过血缘宗亲加强对中央朝

廷的支持。但前者削弱了中央的权力,后者则让诸王们集军、政、财权于一身,手握重兵,坐大封国,形成了张扬分裂、酝酿内斗的祸根。二者合在一起,形成了西晋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,这大概是注重血缘的司马炎所始料不及的吧。

注释:

[1]《晋书》卷2《文帝纪》载:景帝崩,天子命帝镇许昌,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。帝用嘏及钟会策,自帅军而还。

《三国志》卷28《魏书·钟会传》载:毋丘俭作乱,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,会从,典知密事,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。景王薨于许昌,文王总统六军,会谋谟帷幄。时中诏敕尚书傅嘏,以东南新定,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,令嘏率诸军还。会与嘏谋,使嘏表上,辄与卫将军俱发,还到雒水南屯住。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、辅政,会迁黄门侍郎,封东武亭侯,邑三百户。

[2]《三国志》卷28《毋丘俭传》裴注引毋丘俭上表。

(责任编辑:胡晓明)